

马克思主义区域国别研究的国际传播方法论启示

李永虎

(西安外国语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陕西 西安 710128)

摘要: 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重视对世界不同地区和国家具体社会历史条件的考察。他们作为熟练运用区域国别研究方法的杰出先驱, 形成了根植于历史唯物主义、服务于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兼具突出的实践性与辩证综合性的区域国别研究范式。新时代背景下, 中国化区域国别研究应以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为根本, 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核心, 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为导向,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立场的自主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在 firsthand 资料的获取与运用、坚持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的叙事原则、秉持反对西方中心论的研究视野, 以及实施团结国际左翼译者的传播策略等方面的宝贵经验, 为深化当代区域国别研究、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提供了重要的方法借鉴。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区域国别研究; 国际传播; 辩证综合; 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 A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26)01-0056-08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51215717

Methodological Insights for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of Marxist Area and Country-specific Studies

LI Yonghu

(School of Marxism,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710128, China)

Abstract: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examining the specific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 of different regions and countries. As pioneers in area studies and country studies, they developed a paradigm rooted i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dedicated to proletarian emancipation, and characterized by strong practicality and dialectical synthesis. In the new era, Chinese-style regional and country-specific studies should follow the fundamental guiding principles of Marxism, embrace the core vision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and align with major national strategies to build an independent characteristic knowledge system from China's perspective. The experiences of Marx and Engels in acquiring and using first-hand materials, combining universality and particularity in narrative, opposing Eurocentrism, and adopting dissemination strategies that unite international leftist translators offer valuable methodological insights for advancing contemporary regional and country studies and enhancing China'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capacity.

收稿日期: 2025-12-15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24BKS160); 陕西省教工委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进”省级精品思政课程重点项目(SJZ202507); 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2024YB10); 西安外国语大学校级科研项目(25XWC20)

第一作者: 李永虎, 男, 教授。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区域国别研究。E-mail: mrllyh@163.com

Keywords: Marxism; area and country-specific studies;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dialectical comprehensiveness;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for mankind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简称《建议》）明确提出：“加强区域国别研究，提升国际传播效能。”^{[1]28}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和国际话语权显著提升，但在新的国际格局与舆论环境下，要进一步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必须夯实区域国别学的理论与知识体系，深化其在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中的作用机理。

《建议》还强调，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创新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这一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区域国别研究提供了根本遵循。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中国化区域国别研究体系建设，这不仅是深化学科发展的必由之路，也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论支撑。在这一视域下，本文拟聚焦以下几个核心问题展开探讨：其一，马克思、恩格斯是否有关于区域国别研究的相关著述？若有，其研究的基本情况、研究方法 with 理论特征是怎样的？其二，在新时代语境下，如何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基础上实现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创新？其三，经典作家关于区域与国别研究的方法与实践，对提升当代中国国际传播效能有何启示？

一、经典作家区域国别研究的概况、方法与特征

区域国别研究虽然是现当代学术界才普遍使用的概念，但早在19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建和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传播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以及指导和参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过程中，就高度重视对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社会制度、经济结构、阶级构成、哲学传统等社会历史条件的考察，而其问题意识与分析框架为后来的区域国别发展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在这一意义上，他们不仅是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奠基者，也是较早熟练运用区域国别研究方法的杰出先驱。

第一，从研究的基本情况看，区域国别研究贯穿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创作始终，并在其全部著述中占据重要位置。自19世纪40年代起直至晚年，他们运用诸如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亚细亚生产方式、东方社会等分析框架，对世界范围内的众多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多领域多视角的研究。如以国别研究的学术视角来看，其早期实践可以追溯至恩格斯1845年撰写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并在他们后续的诸多重要文献中，如《德意志意识形态》《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革命的西班牙》《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论俄国的社会问题》等著作、评论和通信中得到延续与深化。其研究主题涵盖：英国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遭受的剥削与压迫；德国经济上落后英法却在哲学思想上领先的时代错位；法国的政治局势及无产阶级革命策略；德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及各阶级在革命中的态度与作用；印度与中国在殖民侵略冲击下的社会变迁等——实际上，这些成果只是经典作家区域国别研究宏阔图景中的一隅。1880年9月，美国《太阳报》发表的一篇通讯曾生动地描绘了马克思对各国研究的深厚造诣：“他谈到欧洲各国的政治力量和人民运动——俄国的大规模的思想运动，德国的思想发展，法国的积极行动和英国的停滞不前。他寄予希望地谈论俄国，富有哲理地谈论德国，欢快地谈论法国，忧郁地谈论英国……他一国一国地评述欧洲世界，描述特点、事件和人物——有明摆着的也有藏于深处的。”^{[2]720}

第二，从研究方法看，首先，历史唯物主义无疑是经典作家开展区域国别研究的方法论基石。众所周知，历史唯物主义着眼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整体进程，揭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相互作用的规律，同时强调总体规律总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实现的。因此，马克思主义者在坚持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分析人类社会整体演进趋势的同时，还必须结合不同国家的社会形态、经济结构与文化传统等，具体考察规律在现实中的作用方式。若忽视这一

要求,就容易陷入以根本原理直接套用于具体问题、用理论原则替代实证分析的教条主义错误,从而难以真正运用这一学说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使用一般历史哲学理论这一把万能钥匙,那是永远达不到这种目的的”^{[3]730}。

其次,从具体研究区域国别的方法来看,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结合研究对象的特征,灵活采用多种具体方法进行针对性分析。例如,在分析一国社会结构与社会矛盾时,他们常运用阶级分析法,明确不同阶级力量的构成与关系;在探讨社会生产方式的历史演进时,则采用逻辑与历史统一的方法,以揭示其发展规律;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则通过“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将“一些有决定意义的抽象的一般的关系”上升为“思想总体”“思想具体”^{[4]701},从而深刻揭示了现代资产阶级国家将抽象经济范畴转化为现实统治力量的秘密。

第三,从经典作家区域国别研究的根本目的来看,其理论则体现出鲜明的实践性——始终服务于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共产党宣言》将共产党人的最终目的高度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然而,就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具体形式而言,“首先是一国范围内的斗争。每一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当然首先应该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5]412}。也就是说,要成功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并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主义者必须深入研究和把握各国的具体国情,从现实条件出发确定革命的可能性与实现路径。这也是马克思、恩格斯为什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5]155}

实践的唯物主义者拒绝脱离现实的空想,他们始终关注世界各国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进程,将科学理论与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革命条件紧密结合。例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判了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存在的拉萨尔主义倾向,强调必须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工人阶级;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他探讨了以俄国为代表的东方社会跨越资本主义阶段、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可能性;恩格斯在《美国工人运动》中驳斥了“美国例外论”,并结合美国

的具体国情,主张工人阶级应建立全国性政党,将全国性的政治斗争与科学社会主义纲领结合起来。这些针对不同国家革命道路的分析,不仅揭示了全球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性,也确立了立足具体国情的科学分析框架,为各国革命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南。

正是这种实践唯物主义的理论品格,使马克思主义的区域国别研究超越了单纯的学术探索,成为推动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强大思想武器。

第四,从知识体系的基本特质看,经典作家的区域国别研究呈现出突出的辩证综合性。所谓辩证综合性,既表现在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各国的具体条件有机统一的辩证分析中,也表现在理论视野的跨学科整合上,从而形成既辩证又综合的认识框架。这一点在《资本论》中体现得尤为显著。

首先,从辩证性来看,已如前述,经典作家总是把一般规律放在具体国情的历史语境中加以考察。马克思在对以“英国作为例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中,一方面指出,英国社会的发展道路将成为德国乃至西欧大陆未来的发展现实,因为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规律将“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4]82};另一方面,他又强调,尽管社会发展遵循普遍规律,具有一定的可预测性,但具体国家“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4]83},至多能缩短和减轻自己发展过程中的痛苦。

其次,从综合性来看,为探明英国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状况,马克思首先广泛搜集了工厂立法史、公共卫生调查报告、女工童工的劳动和生活状况等实证材料。随后,他运用历史学、法学、社会学、统计学等多学科交叉的综合分析方法,不仅揭示了工厂立法等制度变革如何成为英国社会内部矛盾发展所孕育的结果,也再现了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演进,从而再次得到相同的结论:“我的观点是把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理解为一种自然史的过程。”^{[4]84}因此,这种辩证综合的理论特性不仅是经典作家揭示社会发展科学规律的基本思维方法,也成为马克思主义区域国别研究区别于其他研究范式的显著标识。

二、新时代中国化区域国别研究的基本理论旨要

在基本廓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区域国别研究的总体概貌之后，如何在新时代条件下推动其中国化发展，已成为我国当前理论界亟需深入探讨的时代课题。对此，笔者抛砖引玉地提出：在新的历史方位上，中国化的区域国别研究应坚持“两个结合”，紧扣中国和世界发展的现实需求，持续推进理论创新，并在理论根基、核心价值与学科使命上形成系统的理论自觉，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立场的自主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为本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官网2024年发布的《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版）》对区域国别学的理论体系作出了如下界定：“中国的区域国别学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对世界各国的历史和现状进行研究，这是中国区域国别学有别于其他国家类似学科的性质所在，是其存在基础。”^[6]

第一，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意味着要坚持运用其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认识、分析他国对我之发展带来的影响，进而提出对策建议。例如，从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就应善于运用矛盾分析法，以使这一综合性研究建立在对各国历史发展逻辑与社会现实矛盾的科学认识之上，“发现矛盾，分析矛盾，揭露矛盾，才能解决矛盾”^{[7]624}。在研究实践中，研究者应根据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历史发展阶段、社会结构特征等，科学识别影响其发展的主要矛盾，同时兼顾次要矛盾，从而做到分析有重点、研究有取舍、政策建议有针对性。比如，面对发达国家，要重视其安全关切，深入分析其地缘战略、科技竞争和社会思潮等；面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则要理解并回应其现代化诉求，重点关注经济结构转型、减贫与发展、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核心议题。这样不仅能使研究更贴合对象国实际，也有助于构建彼此信任与合作的基础。

第二，在新时代语境下，要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与方法

论为该领域研究的原则框架。具体而言，一要发扬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把增进各国民生福祉、回应各国人民普遍关切作为研究与交流的重要目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等，就是为了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为各国人民创造更加美好的生活。”^{[8]401}将中国的发展之道与全球视野相结合，才能使区域国别研究既体现中国立场，又赢得国际共鸣。二要坚持自信自立，立足中国的历史经验、发展实践和外交成就，形成既符合中国利益又尊重各国国情的学术体系和战略视野。三要坚持守正创新，在坚守党领导外交、坚持独立自主和平发展的根本方向的同时，还应积极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国际格局的深刻调整，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提升区域国别研究知识体系的原创性与引领力。四要坚持问题导向，将研究重点聚焦于影响我国整体外交布局和国际传播效果的关键议题，如区域安全架构、经贸合作模式、文明互鉴机制等，做到切中要害、务实有效。五要坚持系统观念，推动中国发展与世界发展相互促进，实现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的有机统一，从而形成整体谋划、系统集成研究格局。六要坚持胸怀天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事关人类前途命运、世界发展方向的重大问题上，“必须体现大国担当，坚持弘扬独立自主精神，坚持引领和平发展，坚持促进世界稳定和繁荣”^{[8]386}，据此，区域国别研究应当置于推动全球治理变革、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格局中，增强大国学术的开放性、包容性与公共产品属性。

（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核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追求的崇高目标，也是中国对“建设什么样的世界、怎样建设这个世界”给出的系统性方案。在中国特色区域国别研究中，这一理论居于基础性和引领性地位，它为不同区域合作、全球治理参与和国际秩序建设提供了统一的价值框架与行动指南。

“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中国倡议扩大为国际共识，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

从理念主张发展为科学体系,成为引领时代前进的光辉旗帜。”^{[8]387}

从理论内涵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要体现在三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其一是目标导向,这一理念旨在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人类发展确立共同方向;其二是实现路径,即通过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新模式,积极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并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重要实践平台,汇聚起各国力量以应对全球性挑战、拓展全方位合作;其三是价值遵循,强调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权主义,倡导文明交流互鉴。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区域国别研究的中国化发展呈现出新的研究逻辑。

第一,在研究范式上,以往区域研究多依托西方学术范式,侧重于地缘结构、制度分析或安全议题的防御性探讨,而当代中国化区域国别研究则更注重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论基底,从共同发展、共同安全与文明互鉴的视角出发,分析中国与各区域国家的互动逻辑与合作前景。这一转向,使研究者能够在“问题导向”与“价值导向”相结合的基础上,为全球治理研究提供中国视角与中国方案。

第二,在研究选题上,研究范式的转型也直接引导选题取向的创新——研究者的关注点日益聚焦于可持续发展、气候变化治理、能源安全、数字经济合作以及文明交流互鉴等共同议题,从全球性挑战的视角探讨合作潜力。在此过程中,推进相关研究不仅需要秉持“互利共赢”的理念,更应体现对世界各国民众共同福祉的关注,从而突破传统研究中过分强调国家利益对立的局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我们要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8]80}

第三,在研究方法上,应当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落到具体的研究路径之中。研究者既可以通过比较研究,考察不同国家在发展模式、治理理念和外交取向上的异同,探寻它们在共建共享过程中的互补性;也可以结合实践案例,分析“一带一路”合作项目、地区安全对话机制或公共卫生协作网络等不同层面的协作经验,从“硬联通”

“软联通”“心联通”的关系入手,理解国家间合作从基础设施和制度机制到社会认同与价值共鸣的深化过程。

最后,在学术使命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让中国学者以更加开放的视野参与全球治理理念的研究与传播。通过系统分析各区域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接受度、认同路径及本土化表达,研究者能够在国际传播与学术交流中更好地阐释中国理念的世界价值,推动这一理论由倡议走向实践,由中国经验扩展为共享智慧。特别是在“十五五”时期不确定性因素增多的背景下,区域国别研究可通过实证调研、比较分析和前瞻性预判,为化解区域冲突、增进互信合作提供具有建设性的政策建议。

总体来看,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核心的中国化区域国别研究,不仅关涉中国理念的传播,也关系到国家知识创新能力与国际话语权的塑造问题。西方区域国别研究起步虽早(源于15世纪地理大发现与殖民扩张),并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学术话语霸权。但在关乎人类发展前途、方向的重大问题上,我国始终牢牢把握着国际道义制高点,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指引下,若能以战略定力持续深化研究,形成兼具学术原创性与现实指导力的中国自主区域国别学体系,便可将这一道义优势转化为学术与话语优势,占据国际区域国别研究的制高点。

(三) 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为要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取决于它满足这个国家需要的程度。”^{[5]11}中国区域国别学的产生本身源于国家战略需求,也只有主动服务新时代大国外交、教育强国建设以及国际传播效能提升等重大国家与社会需要,才能真正体现其价值与生命力。特别是在国际传播领域,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作用愈发凸显。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将其置于文化强国建设的重要战略位置,其核心任务与具体要求也随着时代发展和国家战略需要而不断深化。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创新对外宣传方式,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的重大任务。这一阶段的核心在于提升国际舆论斗争能力,着力扭转我国

在国际话语场域中的被动局面，有效回应质疑，澄清事实，维护国家形象。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的理论研究，掌握国际传播的规律”，这标志着党的国际传播工作更加注重深化对传播规律的认识，强调以受众易于理解和接受的方式进行有效沟通，提升传播的落地效果。2022年，党的二十大提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这一要求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升到塑造国家文化软实力、促进文明交流互鉴的新高度。至2025年10月，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要将“区域国别研究”作为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关键路径，要求在深入了解对象国历史文化和社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开展传播工作。

归结起来，区域国别研究服务国际传播的作用，可从三个方面来把握。其一，服务国家战略。区域国别研究能够为我国重大外交倡议、国际合作项目及全球治理方案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政策背景分析，使对外传播与国家整体战略同向发力。其二，增进文明交流互鉴。通过研究不同文明的历史渊源与文化契合点，有助于在国际交流中营造平等、互尊、互学的氛围，使中国理念自然融入对象国的文化语境。其三，塑造国际认同。以差异化的叙事方式与案例呈现，提升中国叙事的针对性与有效性，从而推动“中国故事”由理念宣示走向持久认同。整体来看，以上三个方面相互贯通，构成了区域国别研究赋能国际传播的主要路径。

从《建议》提出的任务看，区域国别研究服务国际传播的根本要求在于提升传播的亲和力与实效性。为此，首先需要研究传播对象。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政治制度、社会心理、历史文化和利益关切各不相同，这要求我们在充分把握其国情的基础上制定传播策略，避免单一化、模式化的表达。其次要研究传播主题。应根据对象国的核心关切来确定议题，使信息内容与其现实问题、发展愿景相契合，从而促进共鸣。最后要研究传播方式。应重视语言、媒介与互动渠道的多样化，既可以通过元首外交、部长会谈等高层交往推动战略互信，也可借助学术交流、商贸合作、民间往来等拉近民心，实现多层次的互动沟通。

三、马克思主义区域国别研究的国际传播实践启示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引述恩格斯的话，指出：“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9]26}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开展区域国别研究的目的、具体内容等与今天多有不同，但其研究方法仍是我们开展相关工作的重要借鉴。为此，我们以马克思、恩格斯对俄国的研究及其推动科学社会主义在俄传播的实践为例，探析其方法、经验。

第一，在研究取向上长期聚焦专题问题，形成了系统深入的集中论述成果。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沙皇俄国》的统计，从恩格斯在《1847年的运动》（1848）中分析俄国经济社会状况算起，到1890年《俄国沙皇政府的对外政策》为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近半个世纪里直接或间接谈及沙皇俄国这一“欧洲最后的反动堡垒”的文献约500篇，其中专题讨论俄国问题的近70篇，代表性文献包括《俄国的对华贸易》（1857）、《俄国利用奥地利——华沙会议》（1860）、《论俄国的社会问题》（1875）、《〈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版序言》（1882）等^[10]。这种长达数十年的持续跟踪，一方面为完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积累了丰富的实证材料，另一方面为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对俄传播奠定了坚实的文献基础。

第二，在材料占有上掌握对象国语言，重视一手资料的获取与吸收。拉法格在《忆马克思》一文中曾记述：“马克思能阅读所有欧洲语言。他喜欢重复这句话：一门外语是生活中斗争的武器。”^{[11]6}马克思在1870年开始学习俄文时已年过50，对普通人而言，在这个年龄学习一门新的语言已显困难，但马克思仅半年后便能阅读普希金、果戈里、谢德林等俄国诗人和散文家的作品。而其学习俄语的直接目的，则是为了能够直接阅读俄国政府未公开的社会经济调查资料。“无疑地，他是西欧唯一了解这些文件的经济学家。”^{[11]6}此外，从19世纪70年代起，马克思与丹尼尔逊、拉甫罗夫、柯瓦列夫斯基等俄国进步学者交往密

切,通过与这些学者的互通信息与交换资料,两人获取了大量关于俄国社会历史及其现状的一手资料。比如马克思通过对柯瓦列夫斯基邮寄给他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它的瓦解原因、过程和结果》(1879)一书的翻译、摘录,对以俄国农村公社为代表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该书笔记后来也成为研究马克思晚年思想发展的重要文献之一。

第三,在研究立场上,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尊重不同文明的差异化发展道路。这一立场在19世纪70年代末马克思对人类学、东方社会的研究中体现得尤为鲜明。在这一时期的通信及相关论著中,马克思明确支持爱尔兰民族解放运动,批判俄国民粹派的理论倾向,并坚决反对英法在印度、埃及和阿尔及利亚的殖民扩张。通过对这些被压迫民族与“落后国家”的研究,马克思逐步形成了新的判断:资本主义的殖民扩张,不仅催生了新的革命性因素,而且加剧了西方自身的结构性社会危机,在客观上推动了世界革命条件的成熟。这一思想不仅体现在他对世界殖民体系的分析中,也鲜明地反映在他对西欧学者的批评上。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1877)中,马克思尖锐地指出米哈伊洛夫斯基将其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歪曲为适用于所有民族的普遍历史哲学理论:“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3]730}这充分体现了经典作家对欧洲中心主义与线性历史观的深刻决裂。

第四,在叙事策略上坚持将普遍性与特殊性相结合,注重不同国别研究科学理论与对象国之间的切近性。《共产党宣言》(简称《宣言》)作为科学社会主义诞生的标志性文本,自1848年问世以来,便成为“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5]384}。《宣言》之所以能够在国际范围内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除了文本本身有着巨大的思想魅力之外,还与马克思、恩格斯在不同历史时期(1872—1893)撰写的7篇《序言》密切相关。

这些《序言》不仅补充和延展了文本原有的思想内涵,还结合不同民族、国家和时代的具体状况作出了有的放矢的解读,从而与正文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既是深入解读《宣言》的“金钥匙”,也在其国际传播中发挥着重要的导向作用。

在最早一篇,即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指出,《宣言》中所阐述的一般原理的实践运用应“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5]376}。这一方法既是指导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如何使用《宣言》的指南,也回答了“如何使一般原理为世界不同民族和国家所接受”这一国际传播的核心问题。实际上,7篇《序言》本身就是对这一方法论立场的典范性运用。例如在《1882年俄文版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重申了他们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关于俄国可能“跨越卡夫丁峡谷”、走非西方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看法。这种分析既坚持了《共产党宣言》批判资产阶级所有制的无产阶级立场,又结合了俄国特有的经济和社会条件,为《宣言》在俄国的传播奠定了本土化的理论阐释路径。

第五,在译介传播方面,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重视团结国际左翼译者,以确保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有效传播。1869年,巴枯宁在日内瓦出版了首个俄文版《宣言》,但错讹频出,严重损害了原著的理论力量。1882年普列汉诺夫推出了新译本,不仅纠正了早期版本的缺陷,同时附有马克思、恩格斯撰写的《俄文第二版序言》,恩格斯先后在1888年英文版、1890年德文版序言中对此译本都给予了充分肯定。类似这样的理论传播实践经验让他们认识到:译者若缺乏政治自觉与必要的理论素养,译本便可能产生偏差乃至误导读者。因此,对于无法信任或不合格的译者,他们没有作无原则的退让,相反给予了直接而严厉的批评。1894年5月,恩格斯致信俄国民粹派克里切夫斯基,抗议其未经许可擅自翻译并出版《雾月十八日》《雇佣劳动与资本》等作品,明确表示:“对于那些不称职或不能信任的人译成的东西的发表,我就要担负责任。”^{[12]704}因此,他们更愿意将翻译任务委托给品质可靠、有坚定革命信念并与其长期合作的译者,如普列汉诺夫、维·查苏利奇、帕·波·阿克雪里罗得、列·格·捷依奇等。这些译者不仅是马克思恩格斯可以信赖的伙伴,也是俄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

奠基者。他们领导的“劳动解放社”，系统翻译和出版了他们的诸多重要著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在俄国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献。

四、结语

“十五五”时期是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一个发展环境深刻复杂、不确定因素显著增多的时期。在此背景下，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加快构建中国化区域国别学，既意味着对经典理论内核的传承，也意味着在全球化格局重构与学科交汇互动中，持续探索符合中国经验与实践逻辑的自主知识体系。总体而言，这一战略性学科目前正处于理论体系建构的探索期，也是培育原创性成果的重要机遇期。如何在坚守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基础上，有效回应“提升国际传播效能”的时代课题，并推动学科实现从理论自觉走向实践支撑，始终是当代区域国别研究所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经典作家的区域国别研究经验为这一使命提供了重要启示：他们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基础，重视一手资料的搜集与运用，深入掌握对象国语言的能力，反对以单一文明为参照的西方中心论，并注重把握普遍与特殊的统一与译介文本的准确性等，他们的研究堪称连接理论与实践、原理与方法、一般与个别的范例。在新时代条件下，继承并创新这一研究传统，将其立场与方法融入当代国际传播实践，必将为构建既符合一般传播规律、又契合国别实际的传播体系提供坚实支撑，助力中国叙事展现更强的世界表达力

与时代感染力。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25.
- [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 [3]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4]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5]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6] 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 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简介及其学位基本要求（试行）[DB/OL]. (2024-01-26)[2026-01-22]. <https://www.acge.org.cn/encyclopedia/Front/enterEncyclopediaIndex>.
- [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毛泽东年谱（一九四九—一九七六）（第3卷）[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 [8]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5.
- [9] 习近平.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10]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论沙皇俄国[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 [11] 保尔·拉法格，威廉·李卜克内西，弗里德里希·列斯纳，等. 回忆马克思恩格斯[M]. 马集，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
- [12]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与俄国政治活动家通信集[M]. 马逸若，许贤绪，陈光汉，等，译.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责编：程爱婕）